

文化能人型村干部的“教化式治理”

李思楠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

DOI:10.12238/as.v8i5.2965

[摘要] 随着我国步入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乡村治理需要构建更加多元的治理模式。本文根据浙江丰村案例,提炼出“教化式治理”的村庄治理模式。教化式治理是一种包含制度刚性约束与文化软治理两种特征的治理方式。该方式在常规治理方法之外,以强调政教风化、教育感化和环境影响为突出特征。研究发现,文化能人型村干部擅长开展教化式治理。他们通过在村干部和村民关系中嵌入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模式来规范、濡化其他村干部和村民。丰村的治理效果表明,融合银发智慧资源的教化式治理,可以为村庄持久善治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 能人治村;文化能人;教化式治理

中图分类号: G114 文献标识码: A

“Education-centered Governance” of a cultural elite village cadre

Sinan Li

Binhai Research Institute in Tianjin

[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needs to build more diversified governance models. Based on Feng village case, this paper refines the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 of “education-centered governance”. Education-centered governance refers to a governance model with two characteristics: rigi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cultural soft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governance methods, the governance model emphasizes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influenc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This study found that cultural elite cadres are good at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centered governance. They regulate and influence other village cadres and villagers by embedding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cadres and villagers. Village cadres and the villagers are regulated and moralized us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Fengcun Village shows that the “education-centered governance” integrating the wisdom resources of the elderly can provide sustainable internal impetus for the village's long-term good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elites governance; Cultural elite; Education-centered governance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培育出了能人治村和新乡贤治村的治理模式。这两种治理方式成为了解决现有农村治理困境,赋予乡村治理新活力的可行路径。但在治理的具体过程中,能人治村和新乡贤治村都暴露出许多缺陷。过去,在有关能人治村的研究中,学者普遍将能人局限于经济能人的范围内,而忽略了其他能人的作用。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能人治村容易陷入“精英俘获”的陷阱(李祖佩等,2012)。对于新乡贤治村来讲,乡贤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当前基层村两委占据绝对领导力量的权力结构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呼吁着一种更加有效的治理方式的出现,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笔者在浙江省丰村进行调研时,观察到一种之前较少出现的村干部类型和治理方式,那就是文化能人的教化式治理。这

种治理方式突破了当前文化能人难以将道德文化优势转变为现实治理中的能力与权威的困境。从目前村庄治理情况看,文化能人采取的“教化式治理”方式已初显成效。

1 文化在治理中被“弱化”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能人指的是有想法、有能力发展经济并能够做出成就的人士(金太军,2002)。仔细研究华西村等全国模范村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些强村背后都有能人的支持。这些能人以其特殊身份在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国内学者对于乡村能人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各类能人并不局限于单向流动,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有着双向互动,这充分反映出乡村精英在乡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多样性和综合性(李裕瑞等,2020)。

但在这些精英类型中,对于文化精英的讨论较少。由于乡村政治、经济能人的踊跃崛起和乡村知识分子的流出与被遗忘等原因,乡村的文化精英队伍不断边缘化。在“文化”与“经济”的比照中,“文化”的重要性被弱化了,但与此同时现有乡村环境却在呼唤文化、知识、道德的力量。于是,这便形成了一种悖论——宏观层面或抽象层面的文化能人很重要,但落实到现实实践中,其重要性相比以前大打折扣(张英魁,2017)。从前乡贤(文化精英)是我国基层治理的主体,但如今对文化精英的定位却偏向于引领村庄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很少有地区将其重新上升为乡村治理的主体。

文化治理是政府、民间组织、文化能人等主体利用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从而达成治理目标的过程(吴理财等,201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关于文化治理的概念炙手可热。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化的使命是为国家治理提供一整套相对稳定、让广大人民接受认同的思想价值体系,也要为即将到来的制度变革、社会创新等打牢思想基础”(王前,2015)。也有学者提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治理要着眼于文化中轴式社会治理,即把文化作为实施社会治理的关键(谢新松,2013)。比起其他治理手段,文化治理的优势在于能够对人从内而外产生思想和观念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具有持久性和深远性。

2 职业赋权:基于教师身份的信任建构路径

文化能人型村干部的治理效能源于双重身份的互构。研究表明,此类群体需兼具文化资本与治理权威:其一,他们深谙科学文化与乡土规则,既能运用现代知识解构村庄问题,又能依托本土经验实现实践转换;其二,道德声望与经济独立性构成非正式权威基础,使其超越利益博弈获得村民信任;其三,职业特质深度塑造治理模式,如教师群体天然将教化思维融入村庄建设,形成独特的文化治理路径。

相较于新乡贤的社会化参与模式,文化能人型村干部更强调制度赋权的治理权威。前者通过乡贤理事会等协商平台介入公共事务,后者则侧重于自上而下式的对乡村社会的支配,在刚融入村庄之初虽然也有熟人信任关系,但更为强调的是一种客观上的权力与影响(李晓斐,2016)。同时,其文化重建工作并非独立议程,而是嵌入村庄整体发展的治理技术。

程丰的跨界治理实践为此提供典型范例。2013年10月,丰村开始党支部换届选举,最后汪平当选。但汪平以丰村情况复杂、他无法胜任为理由拒绝了这一任命。后村主任选举又因种种原因再次失败。面对治理真空,镇党委书记三顾茅庐邀请镇中心学校校长程丰出山。经多方劝说,这位即将退休的教育工作者最终于2014年1月接任村支书,保留教职实现跨界治理。

程丰的治理认同源于三重维度:首先,40年教学生涯积累的师道权威自然转化为治理权威,师生关系网络重构为干群信任纽带;其次,本土成长经历消除文化隔阂,其“自己人”身份有一种乡土性;再者,教育系统培育的人脉资源形成发展势能,县镇两级党政系统中的学生群体资源使得他在向上争取资金和项

目时变得更加容易。其中文化教育界的人脉关系,也为他后来的文化建设打下基础。

这种职业赋权模式创造了特殊治理优势:教师职业塑造的道德权威消解了权力对抗,教育管理经验转化为村庄治理技术,校园文化营造能力移植为乡土文化再生策略。当程丰将“教书育人”逻辑引入村庄治理时,村民既延续着对师者的尊敬,又体验着新型治理者的服务效能,双重认同构建起可持续的治理信任。这种教师职业背景与治理场域的创造性融合,为乡村能人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

3 五位一体:基于文化的教化式治理

丰村位于浙江省西部,靠近安徽黄山。它曾因自然条件制约深陷发展困境。2016年数据显示,该村人均收入仅5790元,既是省级集体经济薄弱村又是县级扶贫重点村。村庄面临内外双重困境:外在表现为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内在则存在宗族派系斗争激烈、基层组织涣散、干群关系紧张等治理难题,形成“经济贫困-治理失序”的恶性循环。

2014年是该村的转折之年,文化能人型村干部程书记上台,创新性构建了“以礼治村”的治理体系。该体系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强调“治村先治心”的教化逻辑,通过刚性制度与柔性教化相结合的双轨治理机制,实现治理秩序重构。

经过十年实践,“五位一体”治理格局成效显著。政治建设上,村干部立好政治规矩,重视制度规范;主动积极作为,为官观念改变、能力提升,引导协商民主发展,村庄宗族派系关系得到改善。文化建设上,村民已接受并认同程书记在村庄实行的文化措施,家户间矛盾变少,文化氛围得到营造。经济建设上,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有了实质性增加,也达到了深耕文化和产业发展的双重目标。人居环境整治中,村民的环保卫生意识逐渐提高,环境持续改善。社会民生建设上,村两委的种种举措让村民更加感谢和信任村两委,村民的发展机会和权益得到保护。在丰村各项建设都如火如荼的过程中,村民对程书记的信任和尊重已经超越了对以往村党支部书记的支持。

丰村实践印证了文化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一,文化能人的回归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人才瓶颈,其文化权威较行政权威更具认同度;其二,传统礼治与现代治理的融合创新,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文化内生路径;其三,实现了村民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的范式转换,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该案例为同类乡村破解“治理悬浮化”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经验,彰显了文化治理在重塑乡村秩序、激发内生动能方面的独特价值。

4 治理成效:由“脏乱差”变为“先进模范村”

从2014年开始,程书记用十年的时间,将丰村这个“脏乱差”的后进村发展为有礼有序、乡风文明的先进村。到目前为止,丰村已荣获衢州市党建治理大花园先锋队、衢州市民主法治村等荣誉。

村干部和村民是村庄治理中两个最主要的主体,在当前农村基层行政僵化、村民自治运转失败的情况下,丰村村干部的积

极作为和村民的主动参与是村庄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两项成绩。丰村的治理达到了两种平衡,一方面,它实现了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平衡,既完成了上级交付的村庄建设任务,村庄的自治又保持着一定活力;另一方面,它达到了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平衡(冷波,2017)。在乡土文化还未完全被冲击掉的情况下,既采取正式手段来解决问题,推进了规则之治,又善于采用策略主义等非正式手段解决发展难题。总之,这种治理方式对丰村发展产生了良好效果。他破解了经济能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时与村集体利益之间产生矛盾、经济能人偏向于经济建设忽略村庄民主建设等问题。村干部通过积极作为和做出的成果受到村民认可,这些举措使得村庄干群关系缓和。因此村庄的公共权力顺利地转化为村两委权威,并得到空前强化。再次,丰村村民的公众事务参与度相比以前有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投票踊跃、村民代表参与村庄讨论的频率提高、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联系接触变多等。

评价一种基层治理方式的好坏,无疑是要看它是否贴合村庄实际、给村庄发展带来实质变化,看它是否与我国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相契合。不可否认,从这两个角度看,本文所指的“教化式治理”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达到以上两点目的。因此,在当前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在实现多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文化治理的秩序,以此优化村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提出的“教化式治理”具有双重制度属性:既保持行政刚性,又强调文化柔性。其本质是嵌合进去了类似于教师与学生、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教化”关系模式。相较于经济能人主导的利益博弈型治理,这种模式更注重制度规范与文化秩序的同构,追求产业振兴与精神建设的协同发展。

案例显示,教化式治理虽能有效培育治理文化,但仍面临权威集中风险。当能人权威过度扩张时,可能衍生决策专断等问题。但研究假设,若治理文化完成从个人能力到集体认同的质变,便能形成可持续的规范体系。这种转化关键在于将能人特质转

化为可复制的文化共识,使治理秩序摆脱个体依赖。

当前研究虽存在个案局限,但重点想要指出的是:在乡贤返乡政策背景下,文化能人治理为基层治理格局注入新动能。它启示我们重视文化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制度设计促进知识精英与行政体系的有机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具人文内涵的治理路径。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探讨教化式治理的适用边界、文化权威的制度化路径,以及不同地域文化生态中的实践差异。

【参考文献】

- [1]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J].探索,2012(05):187-192.
 - [2]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02):105-114.
 - [3]李裕瑞,常贵蒋,曹丽哲,等.论乡村能人与乡村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10):1632-1642.
 - [4]张英魁.乡贤的外生性及其介入乡村机理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03):79-84.
 - [5]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16-23.
 - [6]王前.理解“文化治理”:理论渊源与概念流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7(06):20-25.
 - [7]谢新松.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8]李晓斐.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04):135-140.
 - [9]冷波.村庄“双轨治理”的特征与效果分析——基于秭归县C村的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3):50-55.
- 作者简介:**
李思楠(1998--),女,汉族,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基层治理。